

编者按:近日,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在京举办了其新书《极花》的媒体见面会,这也是其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继2011年《古炉》出版,《带灯》、《老生》、《极花》相继面世,贾平凹差不多每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不要再写了,我们还没看完,你又写了。”身边的朋友总是这样劝告他,但是贾平凹说:“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心里才能安宁。”对于《极花》,贾平凹说:“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

有些事情写出来才能心安

贾平凹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陕西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楚楚,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却再也别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

西,去过陕西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趑趑趑趑,我就想到了她。

我出身于农村,19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在城市呢?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愿再回老家去。政府发文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

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这何尝不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写她的母亲在3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她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喜欢着水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

写他常常怀念母亲,她母亲是世上撵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撵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40万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却15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15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 and 丰收。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15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嘛哩啦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本文为贾平凹所著《极花》一书的后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当当网发布国民图书消费报告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近日,当当网在其“第十届网络书香节”发布了《书香十年·当当国民图书消费报告》,分别从地域、性别、年龄、数字阅读等不同维度扫描了国内十年图书消费的大数据,展示出国民十年阅读的变迁。报告表明:北上广是图书消费的主力,国民阅读鸿沟逐年收窄,两性阅读差距悄然拉开,不同年龄段阅读口味差异明显,童书一直是当当图书销售占比最大的读物。

当当网副总裁、出版物事业部总经理陈立均介绍,从省份来看,2006年至2015年,北京、广东、上海是图书消费的最强省份,十年稳居

图书购买力前三。据统计,北上广图书消费占比从2006年的66%下降至2015年的42%,而十年整体排名后半段的省份图书消费占比从2006年的6.3%提升至2015年10.9%。总体来看,十年间国民阅读鸿沟逐年收窄,全民图书消费相对均衡。

此外,两性阅读差距正悄然拉开。2006年两性图书消费比例基本持平,2015年,女性的图书消费量已经是男性的1.5倍。过去十年,“90后”对考试类书籍的消费占比最高;“80后”的消费占比主要集中在童书和成功、励志类;“70后”侧重管理类书籍;“60后”更倾向于养生保健和医学类书籍。

教育工作者谈“家风”

本报讯 (记者张妮)4月23日,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人民出版社、西城区教育工会承办的“家风大家谈”主题活动在京举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风》一书作为探讨我国现代“家教、家训、家风”的读物,受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会、北京市第八中学、北京小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相关领导、教师和学者的肯定。

家风、家教、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党

风端,家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北京市第八中学校长王俊成,北京市育民小学校长、特级教师翟京华等均结合自身经历,谈到家庭环境、优良家风家教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优良家风、继承传统家教。

据悉,《家风》一书收录了王俊成、翟京华等资深教育者的文章,共80余篇,从修身、律己、做人、做事、亲情等多个视角探讨“家风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北京西城“阅读推广+”成立

本报讯 (记者张妮)近日,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推广+”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举行,来自西城区出版界、书店等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西城区“阅读推广+”是由西城区文委倡议,隶属于西城区图书馆协会的一个志愿联盟组织。该联

盟以各级各类图书馆为主体,联合区域内出版社、书店、媒体、各类阅读空间等相关单位及其他从事文化或阅读产业的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共享资源,互补共赢,协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助力书香西城建设。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西华书局,当天作为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首次亮相,未来将利用四合院独有的庭院空间,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莎士比亚”何以信步天下

刘 琛

2016年,以推动英国文化国际传播为主要任务的英国文化协会宣布要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名为“永恒的莎士比亚”的纪念活动。可见,“莎士比亚”无疑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经典。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4个世纪为时间轴,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过程与要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莎翁的时代处于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英国国力强盛,开始对外扩张。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1600年,东印度公司建立。在扩展英国海外版图的过程中,英国通过语言和教育等形式强势输出自己的文化,实行文化帝国主义。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英国先后战胜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海上强国。就政策而言,英国不仅继续进行文化输出,甚至将其上升至立法的高度。例如:在其某部法律文件中要求,殖民地必须借助包括电报等现代技术在内的一切手段普及以英语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根据丹尼斯·肯尼迪等文学史研究的结论,莎士比亚在英国乃至域外的经典化主要是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完成的。从这个脉络中,可见莎士比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是当时英国所奉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政策。

在全球化的时代,莎士比亚仍然能拥有世界性文化魅力要得益于其内容和形式与国际传播要求的高度契合。

从内容层面看,莎剧的主题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而非囿于英国或者欧洲的视角。因此,能够在不同文化、地域和时代的语境中得到理解与回应。以莎剧在加拿大的传播为例:鉴于莎士比亚在加拿大的影响力,1953年加拿大开始举办“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戏剧节”。2000年,莎士比亚被加拿大民众投票选为“最伟大的艺术家”。对此,《莎士比亚在加拿大》一文认为,“莎剧在加拿大历经3个多世纪,兴盛不衰,并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力,关键在于他的‘空间’。莎士比亚既倡导和谐的社会秩序,也描述社

会矛盾;既肯定个人的力量,也批判野心、诡计和恶行。重要的是他带着人性的温度去看待和表达这些复杂问题。因此,莎士比亚是独特的和跨文化的。”

从形式层面看,电影和电视为莎剧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7部戏剧,全部被改编成为电影或电视剧。担任主演的多数为著名演员,其中荣获美国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奖的有劳伦斯·奥利弗、马龙·白兰度、丹泽尔·华盛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伊丽莎·泰勒·费·雯丽等。有些将莎剧移植入其他国家,或现代社会的电影同样获得成功,例如:日本导演黑泽明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为电影《乱》,将《麦克白》改编为《蜘蛛巢城》,故事都发生在日本;美国歌舞类经典电影《西区故事》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放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重新进行演绎。此外,莎士比亚本人也成为创作题材,例如描写其爱情经历的《莎翁情史》获得199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莎士比亚属于世界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也是符合、顺应国际传播规律的结果。针对后者的深入研究,对于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乃至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来说更有实际价值。当前,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担忧的文化议题主要是文化的不均衡发展。以语言为例,英国传播学者图苏指出,近两个世纪以来,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商业与传播的通用语。英语全球化不仅给全世界现有的6700种语言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将民族语言边缘化。可见,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现有的国际传播秩序还不能完全赋予不同文化平等地表达自我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化的繁荣当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护和推广莎士比亚等文化经典,但如何从中学习经验,推动本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也应该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纪念莎翁诞辰400周年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活着为了讲述》

本书为《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的自传。“二十二岁的最后一个月,陪母亲回乡卖房子”不仅是这本书的开篇,也标志着马尔克斯文学生命的开始。从那时起,儿时所有记忆深刻的人与事、身边各种奇特的现实、向权威与成规挑战的勇气将他带进了“写作”这个甜蜜而痛苦的陷阱。本书中,马尔克斯没有采用线性的时间顺序,而是自如地在时间、事件中切换,既有对人生中的难忘事件、重要时刻的讲述,也有对他所珍惜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外祖母神奇的鬼怪世界、外祖父的战争故事、挥之不去的老宅记忆、启发并滋养过他的记者生涯……正如他所言,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4月出版)

《德意志的乡愁》

20世纪的德国命运多舛。因为“一战”的失败,德国人告别了19世纪的黄金时代,受制于战胜国的盘剥;因为“冷战”格局,德国被一分为二,沦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该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20世纪德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因緣,同时解码20世纪德国命运之锁,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路途上,保守主义是“乡愁”的挣扎与救赎。作者曹卫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德国思想史专家。

(曹卫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北京四合院志》

这是一部全面介绍北京四合院的资料书,收录了北京地区形制完整的923座四合院的有关资料,系统介绍了四合院的位置概况、建筑形制、历史变迁、人物故事和现今状况,包括700余幅院落平面图,40余幅街道示意图和政区图,以及4000余幅四合院的图片资料。一桩桩如烟往事、一个个传奇人物,为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增添了鲜活色彩,寄托着老北京人的无尽乡愁。主编段柄仁为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主编。

(段柄仁 主编 北京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云深不知处》

本书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共有文章28篇,记录了作者对过往的回忆。特别是与季羡林、臧克家、顾颉刚、郭沫若等大师、学者、文化名人的交往。这些往事,点点滴滴,真切感人,使读者对这些大师有了更多、更感性的了解。书稿还有一部分是作者在国外游历时的感悟,如浏览那些名人故居、墓地、遗迹的所思所感。再有一部分是作者对当年在中华书局一起共事的领导、同事的回忆,特别是对《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回忆,不仅是对一个杂志创办初期艰苦岁月的记录,更是对上世纪80代初期全国上下无处不在的读书潮的记录。

(杨牧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出版)

《背影》

本书详述了文史名家柏杨少年失学、战乱从军、冒名读书、远渡台湾以及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著史的人生经历。作者郭本城为柏杨长子,在父亲过世后,他借助文字重温父亲的苦难、抗争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感悟。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呈现出父亲爱好和平的精神、诚信宽恕的思想和坚忍卓绝的毅力。同时,作者因父母离异,曾对父亲有过诸多疏离和误解,本书也是作者走进父亲内心世界的又一次心灵旅程。

(郭本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采菊集》

周传家,长期从事戏剧史论研究和戏剧评论的教学与研究,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戏曲》等专著。这本文集收录了周传家的20余篇作品,共分纵览篇、论议篇、交谊篇三大部分,包括《浅议京剧〈锁麟囊〉与儒、道、释的精神联系》、《青春版〈牡丹亭〉的数字化技巧》、《男旦艺术的思考》、《大陆小剧场戏剧的复兴流变与思考》等戏剧文论,兼具学术价值与趣味性。

(本书编委会 编 学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